

一笔闲话

郁震宏(七〇后生人,桐乡市大麻镇人,任中华书局编辑三年,参与编辑《全元诗》、《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数十种。曾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楚辞》课)

我的中学

人,喜欢说实话:“街上人齐整是齐整的,沈燕霞就像观音菩萨!”

中学时候,读书最用功的,大概要数程水林了。水林用功用到常常出鼻血,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因为全神贯注,以至于突然鼻血如注,把瞌睡懵懂的李其中、范厂长惊醒。功夫不负有心人,水林的成绩就远在李其中、范厂长之上,但据精通阴阳五行的邱秋英说:“水林出鼻血,不是因为读书用功,主要是他取的名字缘故,水者,血也;林者,淋也。这个名字,就注定了要出鼻血。”张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这类歪理邪说一向是不相信的,并且利用上课时间写了《水林同学出鼻血考》,进行科学论证,有效地驳斥了邱秋英的说法,维护了科学的尊严。可惜张伟在写文章的时候,被郁高娟看到了,并报告给了老师,害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张伟立了一节课的壁角,就在这一节课上,李其中和范厂长开心地终于没有睡觉!

读书最不守规矩的,除了李其中和范厂长,大概要算我了。我素来讨厌做早操、眼保健操,以为一群人被一只广播指使着,叫你做这做那,感觉像在被广播当猴耍,还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实在肤浅之极。因此我常常故意迟到,逃避早操;一到眼保健操时间,就故意上厕所,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视力依然像小时候一样,而坚持做眼保健操的同学比如程水林、徐雪妹等反倒戴上了近视眼镜,使我颇感庆幸,但有时却也很沮丧,因为想装文人就相对难一点。读书时候,我家里养了四只羊和一个鱼塘,放学以后割草要割到天暗,晚上又要在蜡烛下做作业,做完了作业还要偷偷看店小说,睡得很迟,白天就很累,全靠上课时候睡觉,才能补

回点精力,也因此常常收到徐老师的批评,但是我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老师批评去吧,因为倘若上课不睡觉,我自己累倒是其次,家里的鱼、羊就要为此受苦了,众生平等,我心何忍?

中学时候,对我来说,唯一有意思的不是上学读书,而是休息天。父母每天去临平做生意,休息天我常随他们到临平,母亲会给我零钱,我就去新华书店,买过《史记》、《唐人万首绝句选》、《儒林外史》之类。买回家,当故事看。前段时间理书,居然理出了《唐人万首绝句选》,里面还有我十四岁写的两句诗:“自古骚人伤秋色,一样情怀在此时。”格律是错的,意思也俗套,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古诗还是少读为好,对于孩子,我只主张他多看些外国书。记得还有一次,我和范厂长、李其中约好骑自行车去崇福,那时候,久仰崇福大名,却从没骑车去过,问了人,说是沿着杭申公路往东就是,我们骑了半日,也没见崇福,肚皮饿得要命,想吃点东西,李其中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冲饭店,我们去吃点冲饭吧!”我和范厂长不知道什么是“冲饭”,只好跟着李其中回头骑,骑了一程,李其中停了车,说:“冲饭店到了!”我们一看,原来写的是“冲板”店,李其中坚持认为他没有认错字,直到走进店去,才知道错了,出来时还说:“饭字,就是木字旁的,是他们开店的写错了!”

我从来不做眼保健操,眼睛之好,至今还是全班第一;李其中、范厂长读书时成绩倒数第一,第二,现在却是同学中最著名的土豪,程水林说:“早知如此,当年就不必用功读书了。哎,可惜我那上百斤的鼻血,算是白流了!”

你知道为什么马路上都是金光灿灿的屎臭吗

谁也吃不到一百颗。无论是炒了或煮了吃。”我很赞同周作人的说法。就好像你想要看银杏树林的风景,总得忍受它的臭味。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银杏树是有雌雄的,它们的区分其实很容易,比如树冠瘦瘦的,一般是雄树,树冠岔开来一些的是雌的,单棵树看分不出来,但在苗木基地,成片的银杏种在一起,看过去就能分个大概。

银杏为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系我国特产,仅浙江天目山有野生状态的树木。

这句话有三个概念很重要,也就是说银杏它老人家是“银杏目银杏科银杏属银杏”,就那么一个家族里的单传独苗。虽然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银杏,但他是中国特产,其他地方的银杏都是从我们中国出去的。而且即使在中国,野生状态的银杏也只有浙江天目山存在,所以我们依旧说它是稀有树种。



最佳拍档

简单刷了墙壁,放了床铺;另外的全是水泥墙面,电线乱七八糟地挂在墙上。他说,这房子还得装一装,我们两口子还要出去打工,把装修钱挣回来。

老婆是他中学的同学,名叫周春晓,长得很白净,只是眼睛很小,眯成一条线,似乎一直在半笑。两人没扯结婚证,但已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这在当时可算出格。他的父亲到我家来,一提起这桩不告而娶的婚姻,便气得直拍大腿:“买房不听我话,找老婆也不听我话,我是不管了,随便他两口子怎么搞。”

价值两万的房子很阴暗。窗户外是吾县的桂溪农贸市场,有一条涸而不流的河,扔满各种菜帮子、菜叶子、鸡毛蒜皮,死鱼死虾,开窗便是一股恶臭。

自此后我们便未再见。但坏消息一件件,由父母口中传来:他们举办了婚礼,但结婚时夫妻俩吵架了,当场便摔了碗碟;他们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留在村里由爷爷奶奶照看,两岁时跌到粪池中淹死;他们又生了三个小孩,一女二男,但夫妻俩终于离了婚,女儿归母亲,儿子归父亲;他得了癌症,治病花了很多钱。

2012年春节,我回到村里,得悉他正在家里养病。那时他们全家已经搬离七八户人家聚居的三合院,在公路边另造了一栋外表光鲜的三层小楼。

我和我妹妹一起去看他。他戴着一顶帽子,坐在床上。床是旧的,柜子也是旧的,大概是不舍得扔的家具。只有床上的被子崭新亮丽。

他已经不认识我了,问我妹妹:“你哥哥过年没回来?我好多年没看到他了。”

我哈哈大笑:“我不就是嘛,在你面前呢。”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你完全长变了,脸型都不同了。要细看才看出眼睛眉毛有你小时候的样子。”

他的病是胃癌,肿瘤所在的位置在尾椎骨上,发病时坐卧不安,只能站着。谈起生病的原因,“肯定跟工作有关系。我一直在五金厂上班,负责打磨五金,每天都是坐,弓着身子磨产品,一天下来屁

专栏

E-mail:skusky@126.com

闲翻红楼

骆东华(编辑,考完雅思读红楼)

配图/张屹

祸水东引



宝玉挨老爹一顿胖揍,起因是与蒋玉菡交好得罪了忠顺王府,临门一脚却来自贾环的“小动唇舌”。贾环原本带着小厮“一阵乱跑”撞上了贾政的枪口,但他反应迅速——先用金钏儿的死撇清自己,同时引起贾政关注,然后“拉住贾政的袍襟贴膝跪下”,一句真三句假,成功祸水东引,表现真是可圈可点。

好奇心

岑嵘(媒体人,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好奇之心)

让孩子学艺术是个好选择吗

如果你是18世纪初的一个家庭主妇,此刻你正在家里辛勤地织布。上千年来,印第安人、希腊人、埃及人都是这么织布的。可是你很快就会不淡定,因为一样叫做飞梭的东西大大提高了纺织效率,接下来出现了珍妮纺织机,然后是蒸汽纺织机。

无论你多么勤奋,你注定要被淘汰出局,因为你被科技和效率甩得远远的,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进纺织厂替资本家干活。

放眼望去,我们的各行各业无不被一种叫做“效率”的东西深刻地改变着。在19世纪中叶,如果你要从巴黎到波尔多,你必须和泥泞的道路苦苦搏斗,而期间的花费是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收入。而今天,同等的里程只花费同样的人一天的薪酬,而速度提高了80倍。

但仍然有一些领域从来不被效率“插脚”。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表演艺术:一种经济学困境》一书中,首次描述了表演艺术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与现代工业的高效率相比,表演艺术在“技术方面”进步缓慢。

打个比方:两百多年前的莫扎特创作的经典音乐,如“单簧管协奏曲”(K. 622)中的慢板乐章,那个时代演奏需要8分钟左右,两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演奏也大致需要这个时间,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再过两百年这一曲目的演奏时间也大致相同。同样,对于莫扎特创作的众多弦乐四重奏而言,两百多年前需要4个人来演奏的曲子,今天同样需要4个人才能完成。

由此可见,过去几百年音乐家在演绎莫扎特音乐时的“生产过程”几乎未曾改变过,“生产效率”也难以提高。

与其他行业如制造业不断涌现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成本下降相比,表演艺术领域的生产成本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我们进入的演出大厅越来越豪华,为演出所支付的宣传费用也越来越高。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为艺术家们支付越来越高乃至惊人的薪酬。过去的“莫扎特”们,只在演奏大厅为上百人表演,而1962年第一颗电视卫星发射之后,传播有了根本的改变,一场维也纳新年演奏会将会有上亿的观众。198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把这种支付明星天价薪酬的现象称为“超级明星经济”。

表演艺术领域相对成本上升的现象,后来被称为“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如今这一概念已被用来泛指那些机器很难引入,需要较多人类艺术创作的领域,除了演艺领域以外,在不少传统手工业中也存在“鲍莫尔成本病”的现象。

如果说,学习新闻可能被写作机器人替代,学习围棋则会被人工智能轻易打败。那么送孩子去学习艺术是值得考虑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总不希望看到一群机器人在演奏莫扎特或者表演哈姆雷特,毕竟,情感是人类最骄傲的领域。